

林徐典编

汉学研究之
回顾与前瞻

文学
语言卷

上

中华书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选集

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上册：文学、语言卷

林 徐 典 编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宁 德 伟
高 流 水

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全二册)

林 徐 典 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 59¹/₂ 印张 • 1/插页 • 1126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98.00 元

ISBN7—101—01253—1/K • 533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与会学者嘉宾留影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八日

《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目 录

(上 册)

欢迎词	林徐典(1)
开幕词	王鼎昌(3)
主题演讲	
从利玛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柳存仁(5)
汉学研究在中国	任继愈(19)
汉学研究在新加坡	林徐典(30)
总结报告	赵令扬(51)
闭幕词	林徐典(53)
闭幕词	艾温东坡(55)

文学论文

对《诗经》研究的几点意见	余冠英(59)
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金启华(62)
四十年来的中国古典散文研究	谭家健(67)
四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罗宗强(77)
台湾地区四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张静二(86)

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及其当代趋向	徐中玉(93)
庄子文学思想略探	林徐典(99)
乱辞卒章说考辨	黄耀堃(103)
汉赋研究的一些问题	何沛雄(112)
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美发展的艰难历程	
——从汉赋、六朝诗文讲起	龚克昌(121)
汉文佛教文学研究概况及其展望	孙昌武(130)
六朝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邓仕樑(139)
六朝文人的生命意识与诗歌的唯美倾向	王力坚(149)
中国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周勋初(158)
唐代文学研究在韩国	李章佑(168)
中国大陆唐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袁行霈(173)
李白的名士形象	王国璿(184)
近年中国戏曲研究大势	隗 蒂(194)
诗赞系戏曲考	
——中国戏曲史的两大潮流	金文京(202)
近年明清小说理论的研究概况	周伟民(209)
中国传统小说研究在美国	王靖宇(218)
中国大陆近年《三国演义》研究概况	吴小林(229)
关于《西游记》研究的几个问题	袁 珂(239)
研究红学的回顾与前瞻	潘重规(244)
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	
——对红学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三派的学理分析	刘梦溪(253)
苏州李家与《红楼梦》的关系	皮述民(260)
曹学诠议	冯其庸(269)
《麟儿报》的几个日本藏本	辜美高(276)
清诗研究在日本	清水茂(281)
《人境庐诗草》的注释	蒋英豪(289)

清代散曲的发展	罗锦堂(301)
六十年来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	陈锦钊(312)
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前进道路	
——四十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蒋 风(321)
文化转型时期与现代文学研究	乐黛云(329)
现代小说研究在中国	严家炎(33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王润华(343)
新马华文现代文学研究七十年	杨松年(357)
中西比较文学的困局和前景	陈炳良(368)
中英山水诗理论与当代中文山水诗的模式	陈鹏翔(372)
美国的投射诗与中国的现代诗	林 绿(385)
秋的时间意识在中国文学的表现	
——日本汉学界对于时间意识研究的贡献	黎活仁(395)

语言与文字学论文

中国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最新成果	李学勤(407)
从史前陶器的刻划符号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回顾	李孝定(416)
校雠学与中国学术	王叔岷(421)
古籍辨伪学与先秦诸子研究	郑良树(428)
《楚辞》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	翁世华(434)
《说文》许氏六书今议	何 添(446)
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詹伯慧(452)
简说中古音之前入声舒化的路线	陈重瑜(462)
《金瓶梅词话》的方言语音	吴晓铃(476)
汉语现代修辞学研究六十年	宗廷虎(480)
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回顾	郑子瑜(489)
以小见大论修辞	林万菁(499)
中韩语词汇的比较研究	许 璧(507)

欢 迎 词

林 徐 典*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经过一年来的积极筹备,今天在这儿开始举行了。

首先,请让我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对来自世界各地四十四个城市的三百多位汉学专家,和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工作者,以及在今天拨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开幕典礼的各界嘉宾、各报记者、各位同仁、各位同学,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这次会议,是为了探讨汉学研究的成果及其发展前景,并促进汉学同道的思想交流而召开的——一方面是为了总结过去几十年来,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汉学研究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一方面是为了探索汉学研究在今后应走的道路,使各个不同领域和各个不同范围的汉学研究工作者,得以分享研究成果,交流研究经验。

以探讨汉学中的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范围为主旨的国际会议,例如文学会议、哲学会议之类,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不时召开,是常有的。甚至探讨远比汉学所概括的领域、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泛的国际会议,例如东方学者会议、亚非学者会议之类,也不是没有的。可是,聚海峡两岸学者于一堂,特别从宏观的角度,以探讨汉学研究的成果及其发展前景为主旨的国际会议,根据我的记忆,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第一次主办的国际汉学会议,也是新加坡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汉学会议。自从新加坡开埠到现在,已经有一百七十二年的历史,其中一百四十一年,是殖民地时代。在殖民地时代,当然不可能召开这样的会议。独立以后,百废待举,也还未具备召开国际汉学会议的各种客观条件。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特别是由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已决心朝向世界第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作为大学一个组成部分的中文系,经过十年来的稳健发展,目前根据编制,已经可以聘任约四十位教学人员,容纳一千多名学生,在教学、研究,和出版等各方面,已经有相当巩固的基础,并且和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大专学府和汉学名家,已经建立起密切的学术联系的情形下,召开一次国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组织委员会主席

际汉学会议,才可能由构想变成事实。

汉学是以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等社会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这种学问,早就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学问,正如中华文化早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主流之一的情形一样。隋唐时代,日本的学生和僧人,一批接着一批,到中国去学习汉学,形成一种风气。那已经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欧洲人的汉学,从明朝末年意大利人利玛窦翻译《四书》开始,也已经有四百年的历史。直到今天,不但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大专学府里,都设立了汉学讲座,而且还有不少学术机构,是专门从事汉学研究工作的。新加坡作为汉学发源地的一个近邻,就更有了解汉学、研究汉学的必要。何况,“汉学”又是中文系开设的专业科目,也是中文系同仁的学术研究领域。为了进一步搞好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们有必要总结汉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了解汉学研究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现状,并且掌握汉学研究在今后发展的方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主办这一次会议的原因。

我们知道,汉学是以汉族或华族的语文为要素的。汉族或华族的语文,不仅是汉学的主要工具,而且还和各种生活现象、社会现象、历史现象一起,构成了汉学的主要材料。没有汉族或华族的语文,就谈不上汉学,更谈不上汉学研究。所以我们在这次会议里,除了探讨汉学中的几个主要领域——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的课题外,还安排了三场特别会议,和一场座谈会,探讨“双语环境中的华文教学问题”,包括华文教材编写、教学效果评估和语文测试等课题,以便使参加会议的许多华文教育工作者,也能从会议中得益。

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华文教育工作者,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澳洲四十四个城市,总共三百多人;从今天起,将在各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总共一百四十一篇。请让我代表组织委员会,向所有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华文教育工作者,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使我们觉得非常荣幸的,是许多蜚声国际的汉学泰斗,不远千里而来,有的虽然无法亲身出席,可是也提出了论文,表示支持,为会议增添了无限光彩,这是我们要再次表示感谢的。

今天,承蒙副总理王鼎昌先生拨冗主持开幕典礼,教育部长陈庆炎博士在百忙之中光临指教,我也要代表组织委员会,表示感激!

最后,我们也要感谢校长林彬教授、代校长黄兴华教授、文学暨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温东坡教授对这次会议的鼎力支持,以及各基金会、公私机构、商家、校友对这次会议的热心赞助。

开 幕 词

王 鼎 昌*

我有机会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和在座各位讲话,感到十分高兴。这个会议大约有三百多位来自二十个国家的学者参加,相信这是在中国以外所举行的一个规模最大,目标明确而意义重大的汉学研究会议。

我们常听人说“穷秀才”和“富商人”的故事。一提起文人就让人想起清苦的生活,一提起商人就让人想起富裕的生活。在过去,商人和文人之间是有着很大的阶级差别的。可是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发达或发展中的国家里,已经不存在了,亦文亦商的人正在不断地增加。相信在座各位可以证实,今天的专家学者不再穷途潦倒,成功的商人中也不缺乏博学多才的人。

我们希望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断地提高,在经济上能与先进国家媲美,而且过着优雅的生活,为自己所拥有的多元民族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为了达到这个理想,我们推行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在教育方面实施双语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理想。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要学习英文和自己的母语,对于华族学生来说,他们所学的就是英文和华文。

英文是新加坡的工作语文和团结各种族的语文,所以它成为学校的教学媒介语。

华文虽然不是我们的工作语文,但它却是我们表达内心情感的语文。它对我们维持与家人朋友的联系,保存社群的完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华文能给华人带来自尊和信心。

近年来,我们不断地在探讨共同的国家意识,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的国家意识,必须建立在民族意识的基础上。这样的国家意识才能充满生气与活力,才能获得各族人民的认同。如果华人不重视和学习自己的语文,最后连自己的文化遗产也丧失掉,那么我们的国家意识就会缺乏坚固的基石。

为了使学生有效地学习华文,教育部不断地改进教学法,也积极地训练在职教师,更举办了讲故事比赛、作文比赛、诗歌朗诵、问答比赛、相声比赛、辩论会等活动,目的是要把华文的教与学从课室里解放出来。

* 新加坡共和国副总理

我国的学生在学习华文时,一般都能应付;对于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一小部分学生,我们也给予特别的照顾。除了采用特别为他们而设计的教材与教学法来帮助他们外,也为他们举办华文学习营,带他们去参观和参与跟华族文化有关的活动,使他们对华文的学习产生兴趣与信心。

不过任何改善华文教学的措施,都需要完善的考试制度来配合,因为考试成绩决定了学生的前途。教师为了帮助学生作好准备,虽然明知灵活生动的教学法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为了应付考试也只得割爱了。

任何一种语文要有人使用才是一种活的语文。为了鼓励我国学生学习和使用华文,我们必须使他们认识学习华文的重要性。至于怎样使华文在学生离校后,继续成为一种有效的沟通媒介,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考试与华文的使用这两个课题都解决了,我们就能进一步以灵活生动的教学法来教导华文,并且培养学生欣赏华文美感的能力。

普及华语和提高华文程度,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并不希望,也不鼓励大家讲参杂的华语。不过,在提倡与推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尽量鼓励那些不太会讲华语,或讲不好华语的人开口讲华语。所以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不要太苛刻,以避免初学者或程度较低者不敢讲华语。当华文、华语普及以后,我们就能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程度,达到我们的目标。

为了推广华文的学习,普及华文的使用,政府已成立了一个华文检讨委员会,以检讨华文在我国学校里的教导和学习情况,然后提出改善建议。

检讨委员会的任务并不简单。委员会成员必须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华文在我国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必须检讨教导和学习华文的目的,华文的用途及其使用的情况。

我们希望检讨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具体的建议,以改善我国学校的华文教学。我注意到大会的主题之一,是在双语的环境中教授华文。我相信各位学者的研究报告,对于检讨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衷心的祝贺大会获得美满的成果,同时也预祝来自海外的学者们,在我国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主题演讲

从利玛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柳 存 仁*

举世盼望了很久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今天在东南亚的新加坡国家揭幕了！这样的会，不能在新加坡还是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一部分的时候举行，甚至也不能在三十一一年前刚建国的时候举行，却在建国之后刚过三十岁的今天举行了。让我们来祝贺新加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建设的盛大成功！

汉学研究走什么路这个问题，还要在各位——全世界来的 sinologues 面前饶舌，这真是不自量地“班门弄斧”了。现在光说两点，也许可以先稍加强调的，第一点是中国清代的汉学，研究的文字训诂、典章文物，强调所谓“实学”的，其实它的渊源也还是由于宋人（像朱熹）的启发，这层意思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汉学要包括义理，就是哲学、思想史这些学问，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二点是汉学也包括研究域外之学。譬如佛经，今天许多经典梵文、巴利文的本子早已没有了，可是汉译还在，那么中外双方就不能不用汉语本子做这同样的学问。四年前(1987)在瑞典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举行摩尼教第一届国际会议(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ichaeism)不能够没有讨论在中国的摩尼教文献的文章，也是同样的原因。

西方的学者们从西向东看，他们做的有些研究，像亚拉伯、土耳其、伊朗……甚至于古代印度（像吠陀 Vedic studies）这些方面，多数集中在文件字句的推敲和辨认，而且本土的学者数量不多；但是汉学，不但几千年来本国的学者著述丰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像朝鲜、日本、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名誉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

越南和整个东南亚,也都有生活上的活的知识,和大量的书籍、文物。在这个意义上,继续发展中推陈出新、日新月异的汉学,除了考古方面的新发展,和像研究敦煌文献那一类的文书比较是新兴的之外,汉学不论新旧,可以说是“显学”,比西方的学者们研究东方学的其他部门,早已迈进了很大的一步了!然而我们今天如果不愿意抱残守阙,也不想固步自封,我们仍得像今天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样,把汉学研究直推到世界各国人士的面前。

刚才我说西方的学者们从西向东看,这已经是两千几百年前的事了。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史记》里记叙希腊和波斯的战争,曾称波斯和它附近的国家的人都是野蛮人,这是西方人看东方人陌生时的粗印象。其实希腊在布拉的(Plataea)打败波斯军的那一年(公元前479),也正是孔子死的那年,虽然这时候他们心目中的东方还不是中国。可是到了近世,十一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徒虽然抵抗住了一部分伊斯兰教的势力,却又遭遇了蒙古人的西侵。蒙古宪宗(Möngke)八年(1258)旭烈兀(Hülegü)蹂躏了美索不丹米亚,攻陷了报达(Baghdad)^①,蒙古人的势力就逐渐达到中东、近东和东欧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元世祖忽必烈(Kublai Khan)至元十二年(1275)跟随他的伯父、父亲到了大都,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住了十七年,他回到意大利,后来在监狱中口述的《行记》(意大利人叫做 *Il Milione*,也许可以称做《花花世界》^②)里面半纪实半传奇性的叙述中国(远到杭州、泉州、云南这些地方)和震荡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兴旺富庶,当然可以部分地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成见。然而从文化的观点来说,波罗的书虽然流行,但是汉族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教化,他是知道得不多的。蒙古族这时还是游牧和征战的民族,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各种宗教的熏陶。波罗这一行人东来,宗教性的任务不算很重,可是在他们之前,就是在定宗(Güyük)和宪宗还在和林(Karakorum 在乌兰巴托 Ulanbator 西南约二百里)的蒙古包里办公的时候,基督教(广义的 Christianity,非指抗教宗或新教徒)各流派像景教和一些游方修士们(Friars),包括教宗的代表,早已络绎于途了!^③

马可波罗到东方来,走的是旱路,从波斯、阿富汗、新疆到肃州、甘州这条“丝路”来的。他的返程走的却是水路,从泉州出发,由中国海进入印度洋,中间经过新加坡海峡、印尼、锡兰这些地方,到波斯的忽里模子港(Hormuz)。我们现在常说“大气候”,指的是一个时期环境各方面的因素。波罗时候的“大气候”是商人要做买卖牟利,君主和主教一方面想传教,一方面还想联络蒙古,共同对付伊斯兰的势力和进攻。可是到了三百年后利玛窦(Matteo Ricci)到中国来时,他的“大气候”已经和从前迥不相同了!马可波罗坐船,还要依赖亚拉伯人的知识看天星认路。利玛窦的时代,虽然最后一场的十字军战役还不曾到来,但是伊斯兰的势力已经肯定挡住了,欧洲人航海的知识也比亚拉伯人高了。1488年(明孝宗弘治元年)葡萄牙人爹亚士(Bartolomeu Dias)航行直到了非洲的南端,发现了好望角。1498年(弘治十一年)另

外一个葡萄牙人达·嘉玛(Vasco Da Gama)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六年,就到了印度了。欧亚的直接航路一通,葡萄牙人继续活动,他们的力量一直到达印度、卧亚(Goa)、锡兰和东南亚,1511年(武宗正德六年)他们就从马来土王苏丹妈末(Sultan Mahmud)的手里夺了满刺加(Malacca)^④,以后就是北上,叩中国南疆的大门了。这就开启了以后欧洲人争夺东方殖民地的世界。

二

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万历十一年(1583)的秋天由澳门初到广东省的肇庆,那时候万历朝著名的宰相张居正刚死了一年,葡萄牙强占澳门已快三十年了。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贡献真的不小。据说他在澳门住过两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汉文,后来能说能写。他在韶州曾用拉丁文翻译《四书》,后来又帮中国人设计用拉丁字母写成汉语拼音,他这书叫做《西字奇迹》。^⑤我们单凭这两件事情,就可以说他是西方很早启蒙的一位汉学家了!他的《坤輿万国全图》,他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理德(Euclid)的《几何原本》,他在天文、测量各方面广泛的知识,促进了东西方科学知识的交流,可以说是替四百年前中国的现代化铺路。自然,在他住在中国二十七年的期间,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和危虑,更不用说误解,还是很多的。最初他在肇庆城外建立的一座小教堂,中国的知府王泮教人送去两块匾额,一块是寺名写的“仙花寺”,一块是四个大字“西来净土”。这都是把他当做佛教的一派了!就是在他千辛万苦终于获得官方甚至皇帝的支持,在北京有了个小小的立足点之后,他死才不过六年,就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礼部侍郎沈淮发动的要求停止传教和把教士们驱逐出境的奏折。^⑥

利玛窦的时代,很不寻常。在欧洲方面说,北部各派的新教起来,已经颇有规模了。耶稣会在1534年(世宗嘉靖十三年)成立,是公教里的革新派:它不仅要想恢复波兰、巴哇利亚(Bavaria)和比利时人民的旧信仰,还到印度、中国、日本,甚至远到美洲去传教,这些教士们的内心自有一股向上的、不畏艰难的朝气。利玛窦在中国的广东、江西和南北两京各地会见过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是信了教也鼓舞西化的人;像焦循、李贽,这都是极有头脑的思想界的领袖,到今天他们的著作也还值得人们寻思的;所以他以为中国真是了不起,儒家真是了不起,所有做官的人都是 philosophes,就忘记了“读圣贤书”做八股文,对许多人说只不过是敲门砖和工具罢了。他主张传教在形式上不要那么呆板,倾向于同意中国的《书经》、《诗经》里的“上帝”就是《圣经》里的上帝,对于祭孔、祭祖、拜天这些行为,也认为这只是中国人的制度和习惯。这种做法在他主持教务的时候,是曾获得罗马当局

的认可或默许的,因为他推动的传教事业很有成绩。虽说如此,实际上不论在耶稣会内、或会外的其他流派,这些主张后来都常遇到不同程度的反对。例如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可以说是利玛窦临终“托孤”的人,他在利玛窦生前不表示反对,利玛窦死了,他对这些见解就不肯苟同。这种分歧,时间久了,越来越扩大,教廷的态度一变,就成了清初中国当局和教廷之间冲突症结所在的“礼仪问题”。康熙四十四年(1705)及五十九年(1720)罗马两次派专使到北京来,因为教廷这时对这种被它认为是违碍的做法早已下了禁令了。乾隆七年(1742)教宗本笃第十四(Benedict XIV)更重申前禁,一点也不通融。这样,利玛窦的时代一去不返,他的一种关怀人与人间要怎样才能和平相处,他的比较宽容、适应、时时愿意为对方着想的 *modus vivendi*,在历史上就要经过至少三百多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才再有旧案重提的机会了。^⑦

三

比起十九世纪后期在欧洲蓬蓬然兴起的汉学家们来说,利玛窦不算是一位职业性的汉学家,虽然十九世纪才出现的那许多他的后辈们也不是职业的汉学家,他们起先也只可以算是跟利玛窦同行的教士,或者是领事、外交官、翻译员这类的人,不过有的人后来在大学里开始占有一席坐位(Chair)罢了。利玛窦或是那些和他的主张相近的许多耶稣会中人,对于后来他们在欧洲思想界的潜移默化、引起的巨大的思潮,是他们自己也不曾预料得到的。譬如他们说中国人讲的道理里有一种“自然的基督教”,在很古的时候就享受上帝赐给的“特别的赏赐”,中国的制度优美、完善^⑧,这些话在当时未必全能够说服教里面别的人,甚至他们曾把辩论输却,但是过了一百多年,欧洲的法律家、思想家们重新发现希腊哲学里讲的自然定律之后(这自然律很像中国人说的天理、良心),大学者们像陆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Montesquieu)、服尔泰(Voltaire)这些人就纷纷起来提倡自然宗教,反对权威,转而要向东方看齐了!从大的方面说,《美国独立宣言》里提到的“the Laws of Nature”,法国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里的“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至于生活上微细的表现,像西方开始爱好青花瓷、地毯、福建漆器、“Chinese garden”,也说明中国的器物在罗柯柯(Rococo)^⑨时代的吸引力。

假如我们说,马可波罗东来的时代是西方的欧洲人和东方的中国人接触的第一期,利玛窦的时代是第二期,那么,到了鸦片战争前后,从苏格兰来的、信仰抗教宗新教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就可以说是第三期的代表人物了。理雅各是一位代表人物,第一,他是一位教士,在那个时候像他那样为了传教、或是做领事、

或是做生意来中国因而学习汉文的人是很多的；第二，他努力把自己造成一位成功的汉学家，翻译了重要的中国古籍，那些古籍，他和他同时代的别的人都承认要根本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制度，这种翻译是不可少的了；第三，他晚年在翻译和出版了不少部中国的经典名著之后，返英国就任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学教授（1876，光绪二年）。虽然欧洲或是英国之有汉文教授并不是从他才开始的，但是他的著述较多，对后世的影响至少在翻译方面到今天还很大，1960年这些书大部分曾经重印^⑩，我们举他做一个代表人物，旁的相类的人就可以不多举了。

理雅各不但是新教徒，而且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是一位 nonconformist（就是反对已有的教会建制的革新派；这个当权的建制就苏格兰来说就是长老会）。1840年（道光二十年）他先到麻六甲（就是明代的满刺加，经过葡萄牙、荷兰间的斗争，1824年荷兰人就把它割让给英国了），这时鸦片战争还在交战的阶段。伦敦会的活动范围，虽说可以及于广州、澳门，但是澳门是葡萄牙人和公教的大本营，广州又除了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中国不允许其他的英国人居住。理雅各之前那位著名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英国的新教头一个到东方来传教的人，他在这个区域活动了二十五年，是死在广州的。^⑪伦敦会的中心到这时仍在麻六甲，就是因为北上根据地不容易找到的缘故。如果不是有了《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二年，1824）把香港割给英国，理雅各大约仍只能在麻六甲步马礼逊的后尘，做校长，管理圣书印刷所，不会在道光二十三年把教会中心和马礼逊创办的训练传教士的英华书院搬到香港去。

利玛窦在中国住过二十七年。理雅各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到香港，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返英定居不再回来，中间除去他因健康关系或其他原因曾经有两次返国（约四年多的时间）之外，在香港工作的时间也差不多有二十六年。他译的五大卷 *The Chinese Classics*（《中国经典》），包括《四书》、《书经》、《诗经》和《左传》，在他最后离开香港的前一年已经完全印出来了。这个很不简单的工作，印刷出版的时间，五卷前后相距也不过十一年。我们真不能不惊异于这位西来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宏博和毅力了！有人说：“理雅各的译书，受到王韬很大的帮助。”这话不错，但是也并不尽然。王紫诠从上海避祸乘船去香港是1862年（同治元年）十月^⑫，上一年理雅各译的《四书》（就是他的《中国经典》第一、二卷），已经出版了。理、王两个人的合作是从第三卷《书经》开始的，以后相得益彰，直到五卷之后理雅各出版的《易经》、《礼记》，也未尝没有王氏的《礼记集释》或《周易集释》的痕迹。^⑬我这样说，自然不是为的要减低他对理雅各的作品应居的功劳。

理雅各据艾约瑟（Joseph Edkins）说是记忆力极强的人。有一次从英国返香港两人同船，理雅各和他比赛背书，到了背诵《新约》的《希伯来书》（*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他就没法子跟得上。^⑭理雅各又精通拉丁文，对一般古典文字的宏伟体制，早有偏好，所以他虽在

东来之前仅跟伦敦大学的基德教授(Prof. Samuel Kidd)学过几个月的汉文,到了麻六甲就跃跃欲试,开始行动了。我们细读他的每部书里的《导言》(Prolegomena),有时候一篇文字长逾两百页,就知道他的翻译的过程中不仅旁征博采,也往往三易其稿,不怕修改。除了后来王韬的协助,理雅各自己早就清楚地声明他的翻译不是毫无依傍的:在他以前别人用拉丁、英、法、意译出的文字他都要找来做参考。一部书有了几种他人的东西做底本,再加上他和王韬还有一些别人的仔细讨论,错误的机会就比较地少了。只有《左传》一书,他没法得到以前俄国人的翻译。还有《礼记》,这部书可用的蓝本也较少,无疑地它们也是译者更得意的著作。

像利玛窦那样,理雅各也是把中国古籍里的“上帝”解释为等同于《圣经》里说的“上帝”的一个人。他这样的译法,印在书上,还曾经在1880年(光绪六年)六月引起过二十三位人士写信向出版他的书的缪勒教授(F. Max Müller)抗议。^⑮虽然这样说,理雅各和利玛窦还是处在两个很不相同的时代,对中国的态度,也跟利玛窦不同。这在我们说,可以算是理雅各很大的不幸。我们只要看他的一生:到东方来的那一年就赶上了鸦片战争,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他死时,正是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以后,德国就想占胶州,俄国要占旅顺、大连,法国要广州湾,英国索威海卫的时代。其间更有太平天国前后十五年的内战,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攻入北京,以及中国东北边境和西南藩属领土的惨痛损失。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这时真地是“国将不国”了。从利玛窦一直到清初耶稣会教士们活动的时代,他们即使不把中国看得比自己更高,至少是把中国看做平等的,他们还在鼓舞一个理想,向西方人说中国的文物制度是如何的美妙,盼望东和西总有相融和的一天。理雅各的时代,就算讲的是从教士出身后回欧洲做到大学讲座教授的那些人,从好的方面说他们也只是相信一个开蒙觉迷的理想,以为中国是如何需要我的解救;他们是高视阔步地要宣传他们的福音,可是骨子里却深信中国真是黑暗,中国人真是愚昧野蛮,实在是不可救药的了!^⑯时代如此,中国当然也有积弊,亟待改革的一面,我们也不能够说他们这一班人所发的议论对中国就完全没有用。像理雅各在他译的《尚书·导言》第五章最后的几句话也许就可以时时供我们的警惕。他说:“未来的中国到底会是别人的属地,或是还是独立国家,到底会被人分裂,或是能够依然完整,它能否走上康乐昌盛的大道的头一个条件,要看它的读书人和统治者们能否懂得谦卑。除非他们肯听话回头重看一下他们自己的历史和他们的圣人们,那些圣人的名号实在是经不起真实的考验的,他们要是还不停止盲目地赞美他们,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⑰

四

时间过得飞快,从今天算起不过几年(就是香港的领土将要归还中国的那一年),理雅各